

“识字班”承载的红色往事

□冬华

农闲时节学文化

进行革命斗争、组织生产劳动、开展文化教育,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任务。战火纷飞的岁月里,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大力发展抗日小学、正规小学的同时,还开展了冬学、识字班、庄户学等形式的民众业余教育,形成了“村村办学,户户读书,抗日救国,人人争先”的新气象,掀起了面向农民、面向妇女的新文化普及运动。

识字班创始于延安时期,是面向全体大众的扫盲教学形式。起初,识字班按照年龄,不分性别招收学员,统一进行分班,后来由于战争形势所迫,大部分男青年都参军杀敌,根据地识字班中的男性学员数量下降,女性学员数量上升,识字班教育逐渐演变为妇女教育的典型模式。

1939年出现这一办学形式后,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试点,1939年底传入山东革命根据地。1940年,山东省战工会成立后,对山东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统一组织和宣传,识字班开始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。1941年,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在“三八”节的工作大纲中明确提出,要多建立识字班形式的妇女教育组织,之后妇联也致力于做好关于识字班的宣传。妇女群体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后,普遍积极参加识字班,学习态度端正,识字水平在短时间得到极大提升,有了看报纸、认路条、写信等基本需要的文化能力。1946年识字班发展到高潮时,整个沂蒙革命根据地的识字班数量达2万多处,仅鲁中解放根据地的识字班就有5000多个,妇女学员数量达12万人。

冬学是识字班教育中最先兴起的一种办学形式,持续时间久,规模也最大,是沂蒙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、沂蒙群众运动工作和沂蒙妇女教育工作的重点,山东省战工会还专门发表过《山东省一九四二年冬学运动方案》,指导沂蒙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。

冬学,顾名思义,是将教学活动统一集中于冬季开展,一般是从当年的11月开始,到来年的2月份结课,即在农民最为清闲的“冬四月”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。这种教育模式利用“冬藏”的有利时机,把学员组织起来进行集中授课教学,不影响春耕、夏耘、秋收三季的正常劳作。在教学过程中,支前、拥军等内容通过顺口溜或黑板报的形式进行宣传,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、土地改革运动、支前参军运动都是通过冬学来进行宣传动员的,冬学中的大批成员也成为这些运动中的发动者、参与者和践行者。

根据上课时间不同,冬学可分为午校班和夜校班,夜校班男学员多一些,午校班女学员居多。此外,冬学根据学员特点还设置了儿童班、老年班、大嫂班等形式。面对师资力量不足这一现实,

“识字班里真模范,俺到课堂去上班,一直上到下两点,回到家中快纺线;各人识字各人好,妇女地位得提高,能看书来能看报,也能看那北海票……”这是抗战时期沂蒙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的《识字班歌》,时至今日沂蒙地区仍有称未婚女青年为“识字班”的习惯。这一词汇“活化石”,记录着一段红色的历史。



▲识字班的历史影像。

▼妇救会情景再现。



冬学放宽了对教员标准的限制,采用“以民教民”的政策,只要认识字的人,都可以成为不识字人的老师,父母妻儿之间,兄弟姐妹之间都可以成立教育关系,亲友互帮互助,互相学习,更容易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。

化整为零受欢迎

庄户学则是沂蒙地区特有的一种办学形式,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产物,广受民众欢迎。庄户学,又称为村学,是由张建华在冬学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教育方式。1943年11月,刚从滨海中学师范毕业的张建华,应莒南县洙边区刘家莲子坡村的要求,到该村创办抗日小学。开始时,他按照正规小学的办法教学,除周日外每天上课,但学生越教越少,教学效果很差。

后来,他主动走到学生中间,帮助他们拾柴、割草,利用休息时间,教他们识字,给他们讲故事。张建华还将孩子们编成拾柴组、割草组、放牛组,每组发给一个小黑板。他每到一组,在木板上写几个字,先要求学生会念,再要求学生会用。除识字外,他还教学生唱歌,渐渐地参加小组识字的学生多起来。这种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方法,激发了学生劳动、学习的

积极性。牛肥了,草割得多了,柴捡得也多了,村干部和家长说:“这样上学很合乎咱庄户人的口味,像个庄户学堂。”于是,“庄户学”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。

这种教学形式也适合成人学习,于是庄户学由儿童班,逐渐发展到民兵班、青年班、壮年班,甚至办起了老年班、炕头班。莒南县文教科将这一经验迅速在全县推广,将原来的抗日小学识字班都改成庄户学,原先没有创办学校的村也开始办学。一时间,全县形成庄户学开办热潮。

庄户学的教育内容、教育形式、教育时间都是依照庄户人家的农作生产特点而定的。在劳作繁忙的春夏秋冬季节实行分散教学,学员分为各种劳作小组,课堂搬到田间地头,老师在锄头、铁锹上挂块小黑板或识字板,利用劳作休息的时间进行灵活教学。到了冬天农闲时节或天气不好无法劳作时,再组织集中教学,把劳作小组整合成识字大班统一授课。针对妇女的劳作特点,庄户学还把课堂搬进了各家的灶边炕头,在墙头上挂上识字牌,组织相邻几家的妇女一起劳作学习。学员可分为不同的生产互助小组,例如纺织组、纳鞋组、搓线组。姐妹们边做家务边学习,或者边纺织边学习,既学到了文化知识,又可

以交流纺织劳作经验,教育普及与劳动相辅相成。在聊天式教学中,老师们还会积极宣传男女平等、妇女解放思想,破除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奉神论、宿命论等封建迷信,打破陈规旧俗,改善农村的社会风气。

庄户学教学模式多采用“小先生制”,即从小学或中学中选拔出一批成绩较好、识字率较高的孩子作为“小先生”,“小先生”先由“大先生”作示范教学,进行初步的培训和指导后,再派到各家各户,结成教学对子,完成教学任务。由于孩子学得快,性格活泼讨喜,执行能力强,将参与过识字教育的儿童派往田间或各家家里进行教学活动,让他们和大人边聊天、边劳作、边学习,贴近生活、灵活方便,深受百姓喜爱。

莒南县洙边镇刘家莲子坡的庄户学是当时的教育典型,《大众日报》还曾刊登过《洙边庄户学的好学风》一文,宣传庄户学生产与教育紧密结合的优点,后来这一办学形式在整个沂蒙革命根据地得到推广,掀起了社会教育的小高潮。村民们把庄户学编成歌谣来传诵,比如“边识字,边拾草,庄户学,误不了”,由此可见民众对庄户学的认可和喜爱。数据统计,截止到1946年7月,莒南县参加庄

户学教育的学员人数高达10多万人,学员比例达全县总人口的25%。

潜移默化育新人

识字班擅长用顺口溜等方式宣传抗战的革命道理和革命政策,甚至直接把方针政策作为教育的教材和学习内容,例如“一切为了前线,一切为了胜利”“男女齐抗战,学习都争先”“妇女会员支前忙,推面碾米烙煎饼,战士吃饱打胜仗”等,在识字班内广为流传。在教学活动中,还会讲授学员关于抗日持久战的道理,坚定大家对抗战必胜的信心。

同时,根据地的各个路口设置了一批文化岗,将识字班讲授的部分简单汉字或抗战口号写在路口的识字牌上,让负责站岗的同志对过路人员进行问答,认识识字牌上的文字才允许通行。此举既提高了文化素养,也有力打击了敌伪势力。这种政教结合的教育方式,提高了妇女群体的政治觉悟,增强了她们在抗斗争中的参与感和积极性。

识字是文化提升的第一步。在此基础上,沂蒙革命根据地通过识字班教育,成立了9000多个农村剧团,2万多支秧歌队。农民自己建立的农村剧团、妇女剧团也活学活用,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和抗日革命理论相结合,创造了喜闻乐见的《买驴》《王大嫂翻身》《劝郎归队》《反对买卖婚姻》等剧目进行排练演出,识字班中的学员自然是剧团创作和演出主力。截至1945年,仅莒南县成立的剧团就有200多个,85%的村庄都有自己的文艺宣传组织。

随着文化水平提升,姑娘们更加勇敢打破封建偏见。例如识字班代表人物梁怀玉,当时是第一个敢于和男青年同台演出的女性,自编自演的剧目《王宝玉参军》受到大家一致欢迎。除了各种剧团的大量涌现,还有秧歌队、歌咏队、文化宣传队等不同形式的宣传组织,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谣。名曲《沂蒙山小调》前身《反对黄沙会》,就是在这时期创作出来的,该曲后来由山东军区政治文工团重新填词,逐渐成为代表沂蒙革命经典的经典曲目,“沂蒙好风光”深入人心。

从一般的冬学、民校、识字班到庄户学,是沂蒙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,更加广泛地联系了群众,扩大了教育面。据统计,滨海区莒南、莒中、日照3县,参加学习的农民近40万人。其中,莒南14万人,占全县总人口的56%。鲁中沂蒙专区亦有25万人参加学习。

识字班不仅是一种学习形式,而且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,它团结和争取了广大青年妇女,成为妇救会、党组织的得力助手,在拥军优属、扩军支前、生产备战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沂蒙革命根据地女青年在参加学习、工作的同时,也使自己得到了解放,如她们普遍开展剪发、放足运动,提倡婚姻自主,婚事新办,建立幸福美满家庭等,影响深远。